

“符号心理分析”： 建构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

张颖

摘要：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Semanalysis)理论是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意指实践的符号学,它主要针对的是索绪尔以来的符号学研究所出现的僵硬格局。意义不再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而是作为一种意指过程而存在。本文旨在通过对“符号心理分析”理论出现的必然性及其特色的分析,论证“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符号学范式,既改变了符号学研究的格局,又扩大了符号学研究的边界。

关键词：符号心理分析;意指;传统符号学;言说的主体

符号学,研究符号,探索意义。近半个世纪以来,符号学研究不断革新,已经成为语言学、文学乃至文化研究不能忽视的存在。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继索绪尔以来符号学领域的一大革命性成果,它是符号学研究的重大转折,然而,其重要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理论脉络尚待更深入地研究。由此,通过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比较,深入剖析“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重心旨在抛开并推翻旧的符号学理论,创造新的异质的符号学理论,讨论作为交流的语言的异质性。本文将从源起的层面讨论“符号心理分析”与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内涵的层面讨论新的符号学理论深层次的建构问题,并将这种新的符号学理论放置在线性的符号发展历程中,讨论其对于早期符号学研究的革新之处。

“符号心理分析”是政治革命在文化层面的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造反资本主义,影响最大的当属1966年在中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法国五月革命之前,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界,出现了狂热吹捧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论调。这一时期,“某些欧美国家中的一些激进知识人礼赞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期望把毛泽东主义传播到欧美土壤。”^①“文化大革命”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呈现出一种破坏一切、重构一切的精神气质,而这与他们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的诉求是恰好吻合的。于是,在

法国,知识分子和工人开始联合起来挑战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构想和历史样态。

反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在五月革命中的法国社会,充满的全是革命的话语,对于律法、常规和价值的质疑也蔓延到法国知识分子界。克里斯蒂娃身逢其时,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成为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谈到五月革命时,她回忆说:“我是从一个相当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件,把它作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延续,法国的革命运动可以追溯到1848年,当然,更不得不提的是巴黎公社运动。”^②

从精神指引层面来看,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恰好为这些发生在意识层面的革命,在激进的法国左翼学者看来,提供了解读的可能性。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遥远的东方的另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一群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包括克里斯蒂娃从中国的“文革”之中感受革命的激情和可能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的视野中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和重构,正是历史作为一种开放的文本,具有重新书写的可能性的表现。他们将出现在法国的文化革命建构为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实践创造的努力”^③。

1966年的“中国红卫兵造反运动”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内部,而1968年的法国学生造反运动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不同国家制度结构的差异导致这两次从政治斗争演变到文化层面的变革具有极其复杂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刘小枫教授敏锐地指出:“西方‘文革’与中国‘文革’并无异曲同工之妙,两种群众的性质不同,群众社会的制度基础不同,基于不同群众品质的民主诉求亦不同,这样可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同”^④,尽管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无法

提供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参证关系,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法国知识分子界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误读,使得在法国的符号学研究充满了变革和颠覆的意味。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政治革命之果,是文化革命的具体表现。这种以革命的姿态建构的符号学理论,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均表现出颠覆传统秩序的努力。

那么,作为一种批判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批判,克里斯蒂娃的新符号学理论是如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借用与传统的符号学撇清关系的呢?

在论证符号学与生产(production)的关系时,首先克里斯蒂娃指出,传统符号学的观点,与马克思将经济或者社会(所指)看成是一种元素(能指)的排列的立场相一致。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正是在于将社会性看成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模式,而生产具有两种模式:作为一种劳动过程,或者作为生产的社会关系,这种生产的元素构成拥有自身具体逻辑的组合(combinaire)。前一种模式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生产的意义,后者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另一种符号系统。

她批判马克思理论,认为“马克思仅仅将生产看成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一种特定的决定社会或意义价值的一种特定的结构,然而,他仅仅是从社会行为(或者价值)的角度去研究,由此仅仅是关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不是从生产本身的内部来探讨”^⑤。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是从社会角度,是从商品交换和循环的角度研究物质生产,而不是针对生产本身,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未能关注到的生产自身内部的问题出发来讨论。

然而,她的结论却过于主观和武断,她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交换和资本的规律研究……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价值来研究,并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而,他仍然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将自身限定在交换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将自身的分析建立在作为价值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流通产品之上。”^⑥她将马克思对于生产自身内部的忽视,看做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是资本社会的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的结果。

这反映出克里斯蒂娃对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首先马克思在有关生产的讨论中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首先,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物质生产……存在着类同与生产所有阶段的种类,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分类来建立的。对于所有和任何生产的整体情况的研究,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并不能界定任何生产的实际历史阶段。”^⑦对于生产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着整体的生产概念,他反对试图建立统一的生产概念,而强调的是与生产相关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由此,克里斯蒂娃关于生产理论的预设,探究一个总体的元语言层面的生产,以及探索价值、意义产生之前的生产劳动,这一点与马克思是相背离的。

另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马

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生产的最高级、最复杂的历史组织。这种分类表达出其与其他生产结构的关系,由此,资产阶级社会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通过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的以及组成要素,去帮助理解先前社会组成的生产结构及关系……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进行自我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才能理解先前的经济形态。”^⑧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将现存的经济关系看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认为通过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分析,有利于批判先前的社会经济形式。他的要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需要通过不断地自我批判来弄清楚自身形态。

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在研究劳动问题本身和区分不同的劳动概念时是从流通的观点出发,在交换中,价值就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化(crystallized)的形式,劳动的价值只能通过生产产品所花费的社会时间来确定。也就是说,劳动只能代表着它所具体化的部分所拥有的价值。从劳动的界定上,她质疑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的概念,除了生产的空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空间,会导致对生产概念的限定,同时,激起海德格尔哲学的相关批判”^⑨。

从克里斯蒂娃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来看,她试图建立一种非具象的沉默生产(silent production),一种先于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劳动。而这一目的,正是通过“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对于意义指称的过程而非符号系统的强调来实现的。

二

“符号心理分析”理论对于索绪尔以来的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革新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来论证,即超语言学、过程、言说主体。而正是从这三个层面,新的符号学理论彻底重构了符号学的研究路径,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在新的符号学理论产生之初,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超语言学的概念,她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侧重于意义的生成过程,如诗性语言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这完全不同于早期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概念。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话语,侧重于语言的交流过程,仍然是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补充。有学者提出,克里斯蒂娃的超语言学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1. 走出语言:话语(文本)既是由语言构成,又跨越语言、走向语言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2. 穿透语言:话语(文本)既基于语言,又刺破和穿透语言,对语言代码进行重新分配(摧毁和重建);3. 超越语言学这门学科。”^⑩

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研究穿透语言,它超越语言,不可化约到语言。语言存在着一种异质性,不仅是指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中文本之间的相互包含与借用,而且意味着“文本是语言的他者”,因为“文本”不再承担语言的正常的交流的功能,不再是传达一个先在的、固定的、确切的意义的,而是用来生产出意义。写作主体不再是稳定的、变动不居的,而是处在过程之中的,在语言的生产过程

中不停地被摧毁和被重建,并非凌驾于语言之上。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语言一直是作为一套整体的符号系统来探究意义如何生成。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的组合。“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⑩另外,他认为能指具有线性原则,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都是依次排列、线性展开的,字的意义是在与一连串的字构成的语句中形成的,音也是如此。那么,意义并不是内在于意义本身的,而是一种符号区别的功能而已。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我们必须从语言的符号系统中获得意义。符号与它的指称物分离,我们需要在一个内在独立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符号系统中去讨论问题。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符号的意义并不是源自自身,也不是源自与指称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源自这个符号在系统或者结构之中的位置。“结构”或者“系统”成为传统符号学中意义产生的关键词,而这一点,也成为了克里斯蒂娃的新符号学理论的突破口。

结构,常常被认为是任何稳定的、连续的、同质的和同一的实体,它是稳定的、自给自足的。新的符号学理论,关注的不再是结构本身,而是形成统一结构的过程。克里斯蒂娃这样区分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在断裂指出形成的,这种断裂是从过程之中切除的。尽管过程是受到压抑或者排除在外的,但是过程通过充当外在的限制使得统一的结构得以形成。”^⑪

因为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将语言作为一种既有的符号系统来使用,而隐藏和忽视了意义的生成工作,所以新的符号学应运而生了。符号学研究对语言的关注,超越了对交流结构的单一关注,而转向了对生产意义和形成结构的劳动过程的关注,这成为了其理论的源起。

传统的符号学中,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结构使得意义处在一种规定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网中。能指与所指处在统一的、封闭的空间之中。而“符号心理分析”所关注的,是被传统符号学的符号研究排除在外的意义生成的空间和符号的生成活动。所以,“符号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而产生,主要是针对结构主义的稳定性的,它试图强化被符号所压抑的符号自身的生成过程。

“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一种意指系统和实践的分析理论,在一种意指现象之内寻找危机或者意义和主体不稳定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或多种结构的连贯性或者统一的身份,它的重心放在意指过程的异质性层面,而不是结构的静态的身份层面。

克里斯蒂娃的新符号学理论的另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维度,是她提出了“言说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的概念。首先,克里斯蒂娃肯定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超越哲学推理层面的革命性,但是同时也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存在的问题,她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了某种特定语言的组成单位,语言不再是某种系统,而是符号系统。这一结论,一

方面打开了能指和所指的缺口,使得语言学获得某种逻辑和数理层面的形式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将语言或者文本缩减到一种律法或者一种意义中去。”^⑫

那么,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忽视的,正是她关注到的“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的角色。这一类主体,是与历史和哲学话语的主体相区分的,它存在于能指和所指的间隙之中。这样的主体的概念不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先验的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而是处在一种逻辑形态和对话关系的交叉关系之中。

“言说的主体”概念,克里斯蒂娃借鉴了法国的语言学家邦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语言学概念。邦维尼斯特认为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人总是通过他人的言说来存在的,语言确定了人的定义。人是一种言说的主体,正是在言说中或者通过语言,人才能成为一个主体,他认为“人将自己作为主体进行确立,正是在语言之中,同时取决于语言活动。这是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活动,在作为存在的现实和言语活动的现实中,建立了‘自我’的概念”^⑬。我们可以看出,主体是言语行为的主体,通过言语活动,使用句子将自己的主体性作为统一的东西表现出来。

克里斯蒂娃指出,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关注系统而忽视了意义和意指实践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异质性(heterogeneousness)。这种异质性在新的符号学中,是通过语言符号中的韵律、声调等表现出的音乐性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新的意指实践活动,它必须是“言说的主体”通过具体的话语活动来实现。“言说的主体”不再是稳定的、变动不居的主体,而变成了“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

那么,这种可质疑的“过程中的主体”的“过程”,我们既可以作为动词,又可以作为名词来解释。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过程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去中心化的、暂时的存在;过程是一种受到持续改变所驱使的一种连续的状态;过程作为一种被质疑的、过程中的存在。

克里斯蒂娃所关注的符号的意指实践中的异质性,即与“先验的主体”的意识相对立的无意识。“言说的主体”的概念打破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的边界,成为了一种过程中的主体,这种主体独立于符号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与此同时,“过程中主体”引入并参与到符号学中,主体语言的获得也成为了符号学考察的重要内容。

三

作为典型的法国左翼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理论建构之中的政治野心和立场也需要纳入对她的符号学理论的认识中来。作为一位毛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认为发生在法国的文化层面的革命是实现政治革命的前提条件,政治革命是需要一种分析模式的文化革命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她所谓在文化层面的革命,并非是德里达式的解构,消解原有的结构和主体的存在,而是赋予原有的结构和主体一种动态性的存在。

可以说,克里斯蒂娃试图建立的新的符号学理论,是一

种异质的经济体,这类分析理论所关注的不再是符号系统之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试图为意义、结构和主体注入活力,打开传统符号学的结构中的缺口。

对于符号学理论的推进和转型,“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扩展了符号学的边界。克里斯蒂娃通过对弗洛伊德、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克莱因的儿童心理分析理论的借用,将符号学研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研究中解放出来,意义呈现出多样性,主体和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无意识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中被忽略的甚至被压抑的问题提出来,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心。比如诗性语言中存在的音调和韵律的变化,绘画作品中色彩的运用,婴儿话语和婴儿主体的语言活动、女性的卑贱、爱情以及抑郁症等。

新的符号学理论所关注的,并非是语言系统的稳定性存在,而是开放的符号系统,通过那些不可化约到任何符码的符码来实现。新的符号学理论将我们关注的重心转向两种相对立的、不可化约的存在,比如意识层面掩盖之下的无意识,与资产阶级科学理性相对应的艺术的非理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应的先锋艺术。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娃更倾向于后者,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是她一直以来的学术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提出之前,符号学理论的特性是批判性、解构性、规约性,这与长期以来,符号学研究大都建构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之上有关。例如罗兰·巴耳特的符号学理论和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等。

然而发展到“符号心理分析”理论,克里斯蒂娃“言说的主体”等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的拓展,将作为母性空间的“子宫间”(chora)等纳入到符号学研究的考虑范围中来,她实质是将非理性的因素纳入到本身充斥着理性的符号学研究中,从而来呈现符号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心理分析理论从弗洛伊德开始,所致力于探讨的正是被压抑的非理性的领域,心理分析学研究本身是阴柔性、反秩序的、反后殖民的,是排斥逻辑、排斥理性的。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将符号学纳入阴柔的领域中去。简而言之,她是用心理分析改造了符号学的过分秩序化和过分理性化。

符号学理论作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心理分析理论作为20世纪的支柱理论,二者不再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学科而存在,不再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化身而绝对对立。在“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二者实现了有效的融合。这是克里斯蒂

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结 语

克里斯蒂娃在语言、文化、艺术、社会甚至是宗教方面的洞见,以及在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数理逻辑等不同学科之间游刃有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改变认知事物的成见。她的理论建构与运用为我们如何通过符号学的研究来讨论文化以及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作为语言中的一种被隐藏的、有待发掘的异质领域,通过符号学与心理分析的结合,“符号心理分析”揭开了主体愉悦和暴力的面纱。显而易见,一种新的符号意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创造和革新人文学科研究中的诸多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符号学理论一次次从先前的模式中脱茧而出、走向成熟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①加斯托《毛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第15~26页,转引自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②Julia Kristeva, *Revolt, she said: An interview by Philippe Petit*,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p15.

③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p6.

④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⑤⑥⑨Julia Kristeva, “Semiotics: 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 ed. Toril Moi,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1, p81, p82.

⑦⑧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translated by S. W. Ryazanskaya, Online Version, 1993.

⑩秦海鹰《人与文,语言与文本——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欧美文学论丛》2004年00期,第27页。

⑪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7.

⑫Rabine, W. Leslie, *Julia Kristeva: Semiotics and Women*,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Vol. 12, Oct. 1977, pp. 41-49.

⑬Julia Kristev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27.

⑭Emile Benveniste, *Problem General in Linguistic*, trans by Mary Elizabeth Meek,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224.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梅